

江河

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间，北温带几大流域先后出现一批独立创制文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从此，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

地球上诸文明民族创造的文化此起彼伏，交相辉映，其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崛起的中国文化，于坎坷跌宕中绵延生发，成为不曾中辍的“连续性文化”之典范。

读者诸君打开的《江河万古流》，便是一本展示中国文化宏阔景象的读物，它将以文图互映的方式，带领我们走进中国文化史的长河……

【中国文化巡礼】 JIANGHE WANGU LIU 万古流

冯天瑜 邵学海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江河

【中国文化巡礼】

JIANGHE WANGU LIU

万古流

冯天瑜 邵学海 编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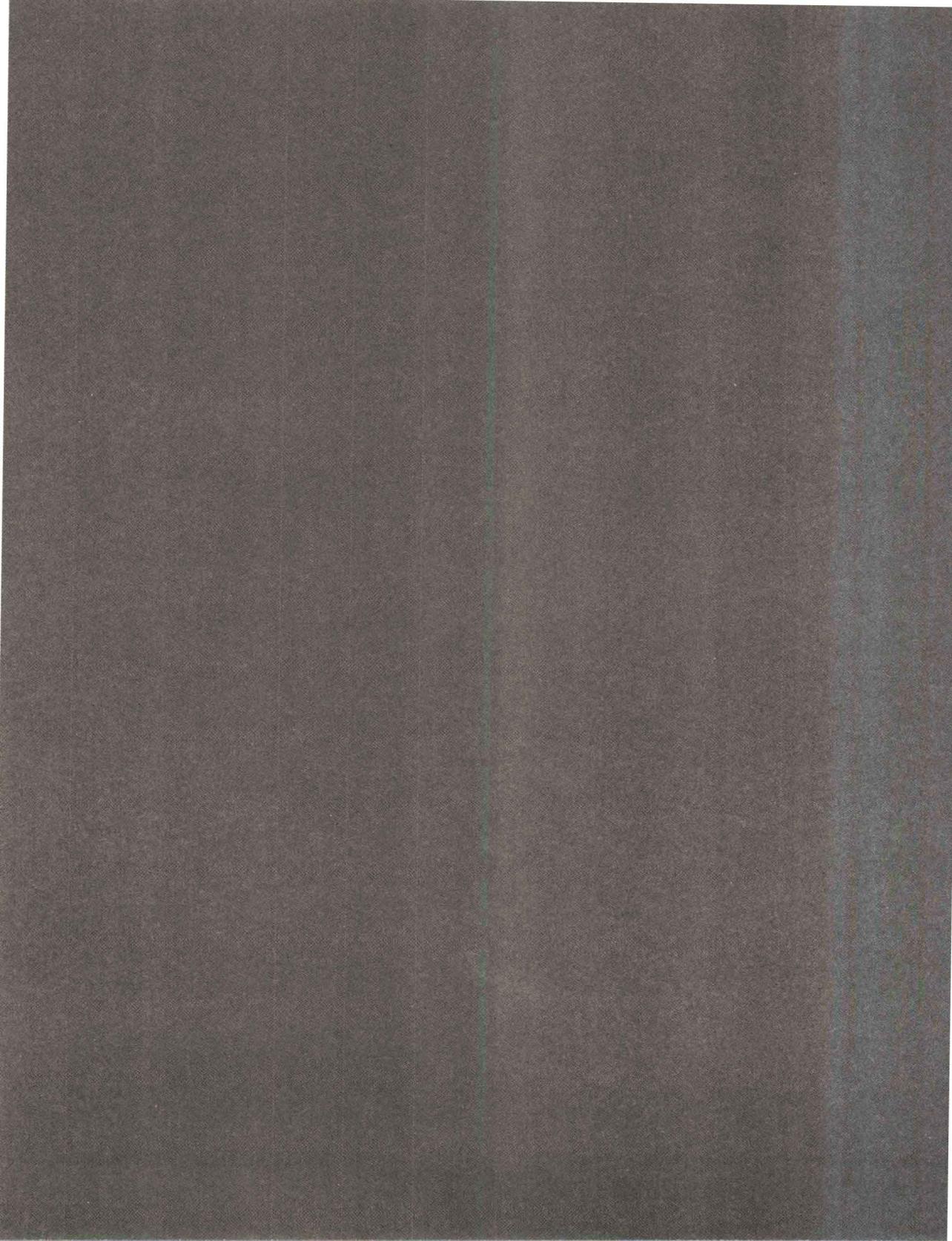
目 录

导 言	1
一、说“中国”	4
二、“文化”及其四分	10
三、中华民族	14
四、文化生态	19
五、文化特质	28
六、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	32
第一章 创榛辟莽	35
一、文化史的首轮主角	37
二、“神农氏”的业绩	40
三、文明之花初绽放	44
四、从“大同”到“小康”	55
第二章 青铜文化	57
一、早期文明的标志	60
二、青铜器铸造与都城营建	65
三、汉字与汉字文化圈	69
四、崇帝尚鬼与敬天法祖	72
五、宗法建构与制礼作乐	75
第三章 轴心时代	79
一、社会变革，文化创造	83
二、从巫史到士人	86
三、私学、诸子及元典创制	91
四、简帛文献再现先秦学术	100
五、“重民轻神”与“民贵君轻”	104
第四章 一统整合	107
一、帝国规模	110
二、国家意识形态	114
三、经学与今古文之争	117
四、长城与丝路	122
五、佛教东传，道教创设	129
六、文史昌盛与科技成就	134

第五章 盛世强音	139
一、多元走向	141
二、清谈玄风	145
三、胡气氤氲	149
四、南学北学的统合	156
五、佛教华化与三教共弘	160
六、有容乃大	165
七、科举制度与寒士崛起	176
八、文的自觉	180
第六章 精致内敛	191
一、文化转捩点	194
二、理学建构	196
三、旨趣的雅化	202
四、俗文化繁盛	208
五、文官制度完善	212
六、文运南移	215
第七章 农牧交会，东西沟通	217
一、农耕与游牧	219
二、东西文化的沟通	224
三、征服者被征服	228
四、交融期的文艺与科技	232
第八章 帝国暮年	245
一、浩大的学术总汇	248
二、文化专制	253
三、从朱子学到阳明心学	255
四、破块启蒙	259
五、郑和下西洋	262
六、耶稣会士来华及中西智识线接触	267
七、市井繁华与章回小说	272
第九章 近代转型	279
一、清季学术的转折	281
二、“种瓜得豆”的洋务新政	289
三、文教新设施与知识分子成长	293
四、从潜流到洪涛	298
五、“德赛两先生”	303
结 语 革故鼎新	307



导 言



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间，北温带几大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先后涌现一批独立创制文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自此，人类走出蒙昧和野蛮时代，跨入文明门槛，赢得发展的加速度。

地球上诸文化，此起彼伏，其中在黄河—长江流域崛起的中华文化，于坎坷跌宕中延绵生发，未曾中绝，成为“连续性文化”的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化”（譬如苏美尔文化经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化）之进程迥然有别。

如果将中华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那么，“中国”是其舞台，“中华文化”则是戏题及内容，中华诸族即为剧中不同角色。

认识中华文化，首先应当了解它的“舞台”、“剧本”和“演员”。



0-1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说“中国”

“中国文化”，概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时代演进，其内涵不断变化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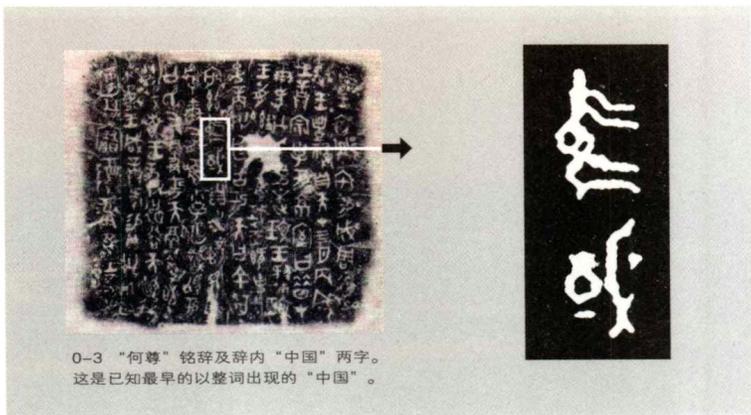
中国之“中”，金文作“𠄎”，意为有飘带的旗帜，是士众集合、围绕的标志，故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后申发为文化或政治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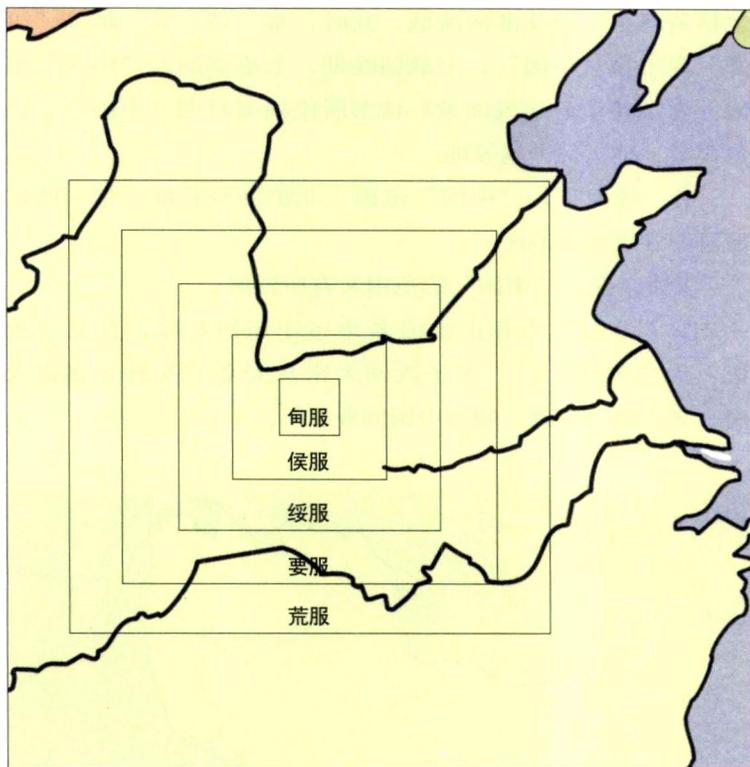
中国之“国”，周初青铜器“何尊”铭辞作“或”，繁体作“國”，原指城邑。古代的城，多为军事堡垒，外“口”（音围）示城垣，内“戈”示武装，引申为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或诸侯辖区，有城中、郊内等义。

“中国”以整词出现，首见“何尊”铭辞：“余其宅兹中国”（周成王在洛邑营建成周，宣称：我要住在天下的



0-2 “何尊”





0-4 春秋时期“五服”示意图

中央)。中华元典如《尚书》《诗经》《左传》《孟子》等，均有相似的“中国”用例。故“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指周天子所居住的都城。

先秦时，有一个较宽广的文明分布区名称，那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扩展开来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幅员，是中华文化演进的最早的舞台。“中国”又泛指中原诸国，即黄河中下游文明早慧、制度早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与较落后的蛮、夷、戎、狄对称。华夏与周边的蛮夷，是“中国”这个舞台上的第一批演员。

根据古人的地学观和宗族血缘的远近，“中国”以王畿为核心，以五服或九服为外缘的方形领地，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展，中心明确而边缘模糊。这个范围，春秋时大体

包括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其时，秦、楚、吴、越等“边鄙”尚不属“中国”，至战国晚期，七雄都纳入“中国”范围。考《荀子》《战国策》诸书所论战国时期“中国”，已包含秦、楚、吴、越等地。

秦一统天下，“中国”范围，北扩展至长城一带，西扩展至今甘肃临洮地区。

汉唐以降，“中国”的范围又有所延展。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并与外邦相对称，首见《史记·大宛列传》：“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

0-5 清乾隆时期中国版图





0-6 《尼布楚条约》前后中国版图对照
(灰白色为条约签订后版图)

“中国”作为一个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北宋不同于汉唐，汉唐超然周边他国之上，君临天下。赵宋则不然，强悍的草原民族雄踞北方，宋朝不得不放下天朝架子，以对等的国与国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事务，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具有较清晰的国体意味。

中国历史上，以“中国”称自国，始于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称自国为“中国”，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此种“内中外夷”的华夷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仍未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

以“中国”为正式国名，始于清朝。康熙时，沙皇俄国的军队在黑龙江上游与清军交战，1689年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端首以满文书写清朝使臣与俄国使臣的职衔，译成汉文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和“斡罗斯御前大臣戈洛文”。这里，“中国”是与“斡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正式国名。

“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虽不断演化，其主旨却始终守住一个“中”字——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这既是地理学的中心意识，更是文化学的中心意识。

中国人由“华夷秩序”向“世界国家秩序”的观念转变，有一漫长过程。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改变了部分中国士人的中央意识，使之省悟到，“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

实际上，“中国”并非中国人的专称。早在晋代，曾西行印度的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说：印度人以为恒河中游居于大地中央，也自称“中国”。针对关于“中国”的虚骄观念，近代学人皮嘉祐《醒世歌》讥诮道：“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作出理性反思。

至19世纪中叶，西方坚船利炮迫临国门，由于外力的作用，古典华夷秩序被近代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益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如林则徐《拟谕英吉利国王檄》说：“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以“中国”与“外国”对举；又如英国钦奉全权公使璞鼎查发布的告示中，将“极东之中国”与“英吉利国”相对应，且文中多有“中国皇帝”、“中国官宪”、“中国大臣”等称名。

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既有“大清”与“大英”的对称，又有“中国”与“英国”的对称，并多次出现“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的用语。

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的威胁，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于是“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被朝野所袭用。

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作国名并用，那么，辛亥革命后，“中国”则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

至此，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概念，历经曲折演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义，演为近代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而与“中国”之名相配的实际幅员，历史上多有伸缩，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体确立中国领土范围：北起萨彦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约1260万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以后，西东列强攫取了中国大片领土。今日中国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

二、“文化”及其四分

“文化”系汉语古典词，由“文”与“化”组合而成。

“文”原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又具体化为文书典籍、文章、礼乐制度，以及与“武”对应的文治、文事、文职，与“德行”对应的文学艺能。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义，与“质”或“实”对称。

“条理”义的“文”，又用以表述自然现象的脉络，组成天文、地文、水文等专词。用以表述人伦秩序，则组成人文一词。

“化”，指二物相接，其中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或性质。由“文”而“化”之，则引申出教化、教行、迁善、感染、化育诸义。

0-7 二十八宿恒星区划体系，是中华民族经过长久观察总结出的重要的天文规律。该图出土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



“文”与“化”合用，首见《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以天象有“文”即条理可循，比拟人伦，亦有“文”可遵，观察此“人文”（人间条理），用以教化世人，便可成就平治天下的大业。这种“人文化成”的设想，是中华先哲对“文化”的理解，在社会理想的追求上，表现出一种区别于“神文”而向往“人文”的趋势。

“文化”构成整词，始于西汉《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在与武力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作为整词的“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至今已沿用近2000年。而包含“人文化成”、“文治教化”内蕴的各种短语、句式，早在先秦多有用例，亦已传沿2000余年。

与“文化”含义相近的古典词是“文明”。“文明”之“文”，指文采、文藻、文华；“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联合而成的“文明”，其意为：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哲文明”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国古典也有将“文明”视作进步状态与“野蛮”对应的，如李渔《闲情偶寄》称“辟草昧而致文明”即为用例。

日本明治维新的中心口号之一“文明开化”，是在与“野蛮”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的。明治间日本文明史观的翻译书和日本人自著书甚多，“文明”成为流行语，吃“文明饭”（西餐）、跳“文明舞”（交际舞）、拄“文明棍”（西式拐杖）、看“文明戏”（话剧）成为一时风尚。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采纳日本这一译词，自19世纪末也多在与“野蛮”、“半开化”相对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

中国人认真区分“文明”与“文化”，始于胡适。胡适1926年刊发《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将文

0-8 近代文明戏《茶花女》剧照。李叔同（左）扮演茶花女。





0-9 甲骨文“文”的结体



0-10 甲骨文“明”的结体

明 (Civilization) 定义为“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将文化 (Culture) 定义为“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张申府于同年发表的《文明或文化》则称，“文化是活的，文明是结果”。我们今天可参考这些定义，区分文明与文化两概念，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观向精确方向的拓展。

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现象，但二者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又有差异：“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即人通过有目的的劳作，将天造地设的自然加工为文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或指超越蒙昧期（旧石器时代）和野蛮期（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三：文字发明与使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1871年在《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一切其他才能和经验在内的综合体。此后，古典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心理学派、文化结构学派等竞相定义文化。

克鲁伯在《文化的性质》中指出，文化概念的发现，是19世纪以来人类学史和社会科学史上的重大成就，其意义完全可以同哥白尼日心说对自然科学的贡献相提并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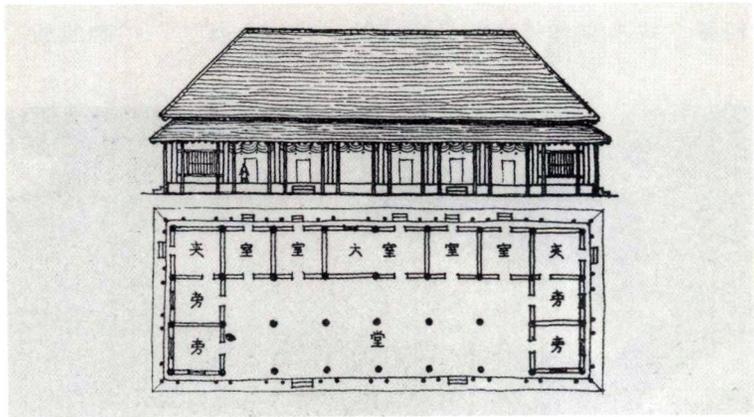
0-11 东周“梁书缶”及其上错金铭文

在学科分野日益细密、切割化达于极致的现代社会，“文化”是少数具有强大整合力的概念之一，其组词功能罕见其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乃至旅游文化、风筝文化、筷子文化等人类文化现象，都可统合在以“文化”为词根的众多词组群中，流衍于人们的口头和笔端。

文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因此，文化分为技术系统和价值系统两大部类，前者表现为器用层面，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构成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后者表现为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两者便是通常说的物质文化（或曰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或曰观念文化）。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前者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后者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风习、礼俗等行为模式。包括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层面的文化，是广义文化。作为不停运行的广义文化在观念领域摹本的精神文化，是狭义文化，狭义的“文化”常与“政治”、“经济”并列使用。



0-12 复原的二里头遗址建筑模型



0-13 现代建筑师根据二里头遗址复原的夏商时期宫室建筑的立面（上）与平面图（下）